

DOI: 10.13288/j.11-2166/r.2016.23.001

学术探讨

先秦、两汉时期象数思维的文化渊源及其对藏象理论的影响

孙相如, 何清湖^{*}, 陈小平, 严暄暄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含浦科教园区学士路 300 号, 410208)

摘要 象数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 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诸多学说得以形成的思维源点。这一思维随着各类学说在不同学科的渗透也逐步成为了古代先贤们主流且基础的思维方式, 无疑也对中医学理论尤其是藏象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了象数思维的文化渊源并尝试分析其对藏象理论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象数思维; 藏象理论; 中医药文化

象数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思维方式, 影响了包括中医学在内诸多学科理论的形成, 成为了中医学在医疗实践活动中收获知识、积累经验并进而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1]。理解并进一步掌握阴阳、五行等概念在藏象等中医理论里的体现与应用, 就有必要认识“象数”这一重要的思维方式。

1 先秦、两汉时期象数思维的文化渊源

1.1 象数思维的产生与确立

“象数”的产生要追溯到先秦、两汉以前。《左传·僖公十五年》曰“龟, 象也; 筮, 数也。物生而后有象, 象而后有滋, 滋而后有数”^[2], 龟卜时产生的裂纹形态便是“象”的起源, 而“数”则源于占筮揲著及数字记录, 人们通过对这两类事物的笃信来揣度事物变化、预测事态发展。可以说, 从中国的神学时期伊始, 象数思维便牢牢地占据了人们的信仰而得以根深蒂固、流传推广。“象”与“数”起初来源不同、意义有别, 之后“象数”结合用以纪日、纪月、纪年, 殷人甲骨中已有六十甲子与干支的全部配合, 继而又配以方位、阴阳、五行。最终, “数”的意义超越了计量、数字, 与“象”紧密结合而成为代表诸多事物意义的符号^[3]。1977 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安徽省

阜阳县双古堆西汉古墓中发现汉文帝七年(公元前 173 年)的太乙九宫占盘, 就是以“象数”结合的形式展现了超前的数字艺术, 这一形式在河图、洛书图、纳甲图等中都有体现^[4]。通过这些图与干支、八卦等内容的配合, 使得象数系统进一步完善, 并最终成为《易经》成书的核心思想, 在《易经》中“象数”融合成熟并形成系统理论而影响深远。

随着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 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知能力及生产、生活的实践能力大幅度提升, 巫卜之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对宇宙万物开始有了趋于理性的哲学思考。但象数思维模式已成为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 且在此思维方式下产生的理论观点往往能以理服人地揭示事物的普遍规律, 由此才产生了以象数思维为基础且成系统的理论著作——《易经》。如《易传·系辞传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5]。一方面说明了“八卦”源于“观象”, 另一方面也说明“八卦之象”能反映“万物之象”。《易传·系辞传上》曰“子曰: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 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 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 鼓之舞之以尽神。’”^[6]。说明了象数思维在表达事物意义方面具有优越性。凡此种种皆是强调了象数思维的权威

基金项目: 2014 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4B357); 湖南省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项目(0111-2001-003)

^{*} 通讯作者: hqh19651111@163.com, (0731) 88458257

性。简单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周易》就是一本论述从卦象推导比拟物象、从物象推导比拟意象之过程的理论著作,可视之为象数思维的滥觞之作^[4]。经由《易经》构筑系统完备的“象数”系统,《易传》进一步对其阐发说明,象数思维得以确立并进一步推广传播而成为古代诸多文化思想形成的源点。

1.2 象数思维的内涵外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物象”和“意象”。物象是事物外在的客观现象、形象,而意象是人们对事物的主观感知和体验感悟。《周易·系辞》曰“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说的便是先贤通过观察事物而感知并比拟得出“象”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人们通过观察事物客观形象进而通过比拟和推导得出其意义、内涵及与其相联系的具有同类性质的事物。由此可概而言之,“象”包含了先贤认识事物的不同层次,包括事物的形象,即物象;由物象比拟推导其意象;通过“象”再援物比类进一步充实“象”的内容^[5]。

“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量化数字和代表事物性质的“数”。“数”产生于度量、记录和测算,有数目、数量、计算的意义,如《管子·七法》言“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指的就是通常人们认识的用以量化的数字。此外,“数”有“自然之理”“易数”等意义,如天地生成数、九宫数、河图数、洛书数等,这是因为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发现自然界的普遍事物都有一定数量的规律特征,如三百六十五日、十二月、四季、五指、五趾等,古人进而对具有相同数字或相承接数字的事物进行了联系推拟和援物比类,从而使“数”成为一类富含事物性质的象征,也使其与“象”的意义共通融合^[6]。《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贵当》曰“性者,万事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 355},表明了“数”是作为自然规律的存在,万物皆有“定数”。《周易·系辞传上》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则申明了“数”在自然界中的权威性。

综上可知,象数思维就是古人在观察世界的过程中通过直接观察和客观感受到的图像、数字以及符号来辩证地比拟推导事物联系、揭示自然规律,

从而构筑了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观^[8]。以这一思维作为基础,古人又不断地对世间万物进行取象比类而进一步充实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如《吕氏春秋·季春纪·圆道》曰“五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9] 49},便是取象天地规律以阐发王制法度。《大戴礼记·本命》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10],以象数思维阐发生命活动变化。《淮南子·地形训》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11],将动物的孕期数与代表自然界事物的“数”联系而做类比;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易传·系辞》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12],将“气、天地、阴阳、五行”等事物与特定的“象数”进行系统联系。诸如此类,在象数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形成了整体联系、丰富且系统稳固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无疑也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2 象数思维对藏象理论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象数思维作为古人思维模式的根本基础,在引入“气一元论”“阴阳”“五行”等概念以后,共同构成了稳定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这一系统稳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医学藏象理论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认为,象数思维对于藏象理论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影响。

2.1 直接观察以认识脏腑形象,即脏腑“物象”

多数人在学习理解藏象理论的过程中主要着眼其“意象”而忽视了与理论相关的“脏腑形象”,象数思维的首要过程就是认识事物形象,即“物象”。无疑,《黄帝内经》作为藏象理论体系形成的滥觞,在象数思维的指导下对于脏腑的形象也有着比较充分的直接观察。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肾

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除略其中对于各藏与四时之气、五色、五味的类比推导。这一段文字首先描述的就是通过直接观察得出的各脏腑生理功能的联系及表现，亦即脏腑的生理“物象”。《灵枢·肠胃》曰“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第四节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则更是直白地描绘了解剖后肠胃的度量形态，是肠胃本身的物理形象。还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岐伯曰：臣请言五脏之病变也。心脉急甚者为瘕疝；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肾脉急甚为骨癭疾；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嗝还出……”，描述的是五脏病变时表现的脉象及外在症状，即五脏病理“物象”等。类似的直观观察结果在《黄帝内经》里论述颇多，有时脏腑之“物象”和“意象”被并列阐述，当我们理解了象数的思维过程，就应当有意识地重视藏象理论中对于“物象”的直接观察并加以区别解读。

2.2 比拟推导脏腑的“意象”

如前述《易传·系辞上》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古人认识到观察脏腑形象后的直接语言描绘是不能将脏腑生理联系、功能表现、病因病机等事物全部表达清楚的，特此在《黄帝内经》中重点提出对脏腑“意象”的比拟推导。运用援物比类方法阐发脏腑的“意象”，使得脏腑的形象活动丰富了起来，不再局限于客观观察到的形态表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便是经典的推导五脏“意象”的论述，其中将五个方位、五种自然现象、五行、五味、五声、五音、五种情志等事物援入以比拟五脏生理功能，使得五脏功能与人体各种生理、情志表现与自然界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描述既基于观察也得益于比拟推导，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五脏“意象”。《素问·金匱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

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将四时、五种星宿、五谷、五畜等事物援入比拟五脏，使得五脏生理形象鲜活具体起来，指导人们进一步认识并掌握五脏特性。《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将官制形象援入比拟五脏，使五脏的生理功能一目了然、生动具体。总之，象数思维方式下比拟推导出的脏腑“意象”使得其生理活动、功能表现等难以直接观察的现象鲜活具体起来，使人们对于脏腑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2.3 总结归纳脏腑生理、病理及诊治规律

以象数思维直接观察得到的脏腑“物象”以及比拟推导得出的脏腑“意象”奠定了中医司外揣内的基础，如《素问·评热病论》言“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不仅是病理规律，五脏的生理、诊治规律也得以进一步推导总结。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便是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以“阳数七、阴数八”与“女子为阴，男子为阳”相合，按“阴阳和合”的“意象”推导出的生长发育规律^[2]。《素问·五脏生成》曰“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结合五脏与“五色”对应的意象，归纳了望诊五色预后疾病的规律。《灵枢·九宫八风》曰“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其气主为热，……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则以方位与五脏相联系的“意象”推导归纳了自然界不正常的气候对于脏腑的病理影响^[3]。还有如三阴三阳、灵龟八法、三部九候等指导诊治疾病的方法皆得益于运用象数思维的推导总结。

3 总结

象数思维作为古人认识世界、解读自然的思维

方式基础,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从而对包括藏象理论在内的中医理论形成了深远影响。我们认为,象数思维对于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包括认识脏腑“物象”,比拟推导脏腑“意象”以使其生理表现、功能活动形象具体以及归纳总结脏腑相关规律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学习理解、实践运用的,切忌执着于其中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内容,尤其是脏腑“物象”。作为医学理论,藏象理论的可靠主要源自直观、客观的观察,而观察也是象数思维展开推导、总结规律的根本基础。

参考文献

- [1] 王琦. 取象运数的象数观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2): 410-411.
- [2] 左传: 上册 [M]. 冀昀, 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 107.
- [3] 张宗明, 赵峰. 自然辩证法概论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205-206.
- [4] 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史 [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4:

236.

- [5] 周易全译(修订版) [M]. 徐子宏, 译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290-323.
- [6] 张其成. 东方生命花园: 易学与中医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9: 103.
- [7] 吕氏春秋 [M]. 李春玲, 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8] 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 289.
- [9] 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M]. 高明, 注译.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460.
- [10] 刘安. 白话淮南子 [M]. 安顺, 张文年, 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138.
- [11] 王应麟. 王应麟著作集成: 周易郑康成注 [M]. 郑振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55.
- [12] 张介宾. 类经 [M]. 郭洪耀, 吴少祯,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28.
- [13] 高立珍, 孟彪. 浅谈《周易》与《黄帝内经》中的象数思维 [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0, 31(3): 55, 80.

Cultural Origins of Image & Number Thinking of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SUN Xiangru, HE Qinghu, CHEN Xiaoping, YAN Xuanxuan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ABSTRACT Image & number thinking, as a very important way of think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thinking original point in forming Yin-Yang theory, five-phase theory and other theories. With the penetration of various theorie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is way of thinking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and basic thinking way of the ancient sages. It is no doubt that it has a deep impact on form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image number” thinking and they try to analyze its impact on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Keywords image & number thinking;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6-06-20; 修回日期: 2016-07-30)

编辑: 黄 健